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社会工作
流派译库
(第二期)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英] Lena Dominelli 著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 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社会工作
流派译库
(第二期)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英] Lena Dominelli

著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

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英] Lena Dominelli 著;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译.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12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 第二期)
书名原文: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ISBN 978-7-5628-4121-0

I. ①女… II. ①Lena… ②王… ③张… ④李… III. ①女性-社会工作-研究 IV. ①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9415 号

Copyright © 2002 by Palgrave Macmillan.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1045 号”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第二期)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著 者: [英] Lena Dominelli

译 者: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

项目负责: 刘 军

责任编辑: 刘 婧

责任校对: 金慧娟

整体设计: 袁银昌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 话: (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3797(编辑室)

网 址: press.ecust.edu.cn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28-4121-0

定 价: 56.00 元

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 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 e.weibo.com/ecustpress

淘宝网 <http://shop61951206.taobao.com>



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译库顾问

钱旭红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院士
柳 拯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译库学术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Ira Cobly 美国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ack Richman 美国北卡大学(UNC at Chapel Hill)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ohn Carpenter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工作教授
Lena Dominelli 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社会工作教授
Patrick O'Leary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阮曾媛琪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前主席、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教授
宋林飞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陈丽云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主任、教授
范 斌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
徐永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永祥

执行主编 何雪松

委 员 范 斌 张 昱 朱眉华 费梅苹 曾守锺 赵 环 王瑞鸿

这是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第二套译著丛书。本世纪初，我们所推出的 18 种一套上海市重点图书“社会工作名著译丛”获得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本套译库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加聚焦于介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流派，但又不局限于理论流派的译介。西方的社会工作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诸多视角、理论、模式与方法。知识转移与全球共享是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熟知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对于建构兼具国际规范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制度、实务模式，无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唯其如此，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才有可能参与全球专业知识库的建构，以推动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制度设计与发展经验具有本土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框架去加以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警惕本国专业共同体因理论的“不自觉”“不自信”而在全球知识界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必须立足和扎根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新社会组织、新社会服务和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的实践，积极进行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创新。唯其如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界才有能力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从而为全球社会工作贡献中国的力量。

衷心希望本套译库能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支持，以进一步推动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与知识建构。须知，没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的科学支撑，就不可能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发展实践。

本套译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为此我的感谢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里，我要向所有参与翻译本套译库的同仁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奉献体现了社工学人的专业精神！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因为他们始终对我们充分信任及对社会工作学科建设鼎力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何雪松教授，因为他持之以恒的追求、坚持和奉献，我们才有了本套译库的中文版！

是为序。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徐永祥

致 谢

写书从来就不是一项个人单独可以完成的工作。知识是通过人与人的互动产生的，即使一个独处书房的作者，他同样要依赖他人所获得、创造和传播的知识。相应地，如果没有读者的互动，写作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学术著作的写作却另有一套更加严格的规范，它影响着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并将他们放到了更为正式的要求之上，也就是学术的要求。

我想感谢许多无法具名的朋友，他们为本书的写作贡献颇多：那些同意接受我的访谈的人，那些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和我相互交流信息的学生，以及那些和我一起分享知识的同事。除此之外，我还要向以下各位表达我诚挚的谢意，他们为我的写作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们是：Marilyn Callahan，她读完草稿后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支持和回馈；我的父母，他们用无尽的爱与智慧陪伴着我的写作之旅；我的兄弟姐妹，当我感到迷茫时，他们的情感支持了我；还有 David 以及 Nicholas，他们用爱、智慧和同感包容了我的多次缺席。谢谢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本书的诞生！

Lena Dominelli

1999 年夏

目

录

导论	I
第一章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基础	19
第二章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具体探讨	47
第三章 重新定义专业性	75
第四章 男性	97
第五章 儿童和家庭	121
第六章 成年人	143
第七章 罪犯	167
第八章 结论	189
参考文献	197
索引	213

导

论

在被称为“后现代”的当今世界，女性主义似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词汇。西方的媒体自负地宣称女性主义已经过时，因为，我们现在已进入后女性主义时代。然而，对于我这样的女性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女性所体验到的女性主义，一直充斥着贫困、日益严重的性暴力、越来越少的福利服务、日益受到失去生活和地位的威胁，我惊讶竟有这种说法，认为女性主义的诉求已得到实现，不再需要女性继续花费精力去奋斗。

特别是考虑到正在工业化或低收入的国家中女性的日常生活现实，这种立场更是显得荒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贫穷就像是地方病一样，致使很多儿童和成年人苦苦挣扎，试图维持食物、水和住所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UNDP, 1998)。在工业化国家，众多的社区失去了制造基地，随之失去的是本可以使年轻女性经济独立和自主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年轻男性的高薪酬的制造业技术岗位也消失了，这导致失去社会地位和生活目标的年轻男性走向犯罪道路并与社会隔离(Young, 1999)，同时，也带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试图让这些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及在照顾儿童和老人方面共同承担责任。

如果女性不是在家庭和社区中从事大量的艰苦工作，她们的疏离感和苦难感会更巨大。通过无休止的工作，女性设法保持了身体和精神的融合，至少在彼时彼刻，在希望明天会有更好的期待中，身体和精神保持一致。女性梦想着到那时，也许她们和她们所爱的人会自由地享受他们所选择的生活。这个梦想至少在那些橱柜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喂养婴儿、皮夹里没有钱给奶奶买药的绝望的时刻，能让女性保持乐观的心态。女性的这种决心要在凄苦的社会境况中活下来并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愿望，激发我去推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以此为女性所期望的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这一目标贡献力量。但是，这个过程不能以一种朴素和宿命的方式进行，而是要融入其他人的关注和参与。

照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可是，它也是一直被低估并被视为一项理所当然的、女性天生该做的工作。然而，女性还是不断参与到周而复始的照顾别人的过程中，她们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投入精力以确保所爱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女性所做的一切看似不需努力，有些社会工作者也这样认为，因此，人们往往看不到女性为了维持生存所付出的极大的心血(Callahan, 2000)。而且，社会工作者有一种倾向，认

为女性是一个自治的孤岛，能自己在艰苦的社会沙漠中创造绿洲。在贫困社区中，每个人都受苦于不断加剧的贫穷，而传统社会工作的女性工作者很少关注造成女性贫困的社会结构原因。虽然女性社会工作者在女性努力奋斗及共同意识唤醒(这种共同性有助于跨越性别隔阂)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女性社会工作者也如同其男性同事一样，期望女性在最冥顽不化的性别歧视的社会环境中能掌控生活，而当女性做不到时，同样会严责她们。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女性个人要对毁坏她们精心设计的生活计划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负责。这些专业人士在介入女性生活时，会毫不怜悯地将女性推入病态化过程，因此，很可能摧毁女性展示出来的脆弱的自我效能。所有这些都是在鼓励独立、确信福利国家和他人慈善是靠不住的名义下发生的。女性应该被灌输的是“要举手奋斗，不要伸手施舍”，政治家如是告诉女性(Blair, 1999)。但是，没有资源的支撑，就像在不断扩大的裂口上放一根稻草当作桥一样，非常容易就断裂了，而留给毫无准备的女性的是更多的待处理的问题。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宗旨是处理这些议题，而处理的方式是将女性以及消灭结构上的性别不平等放在实务的中心位置。我将在本书中探讨这些原则。借此，我质疑将女性主义贬入历史冷宫的想法，并提出在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当今社会工作实务中，女性主义是很有意义的。今天的情况与我和 Eileen McLeod 写《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仍保有那时的一个特征——用乐观主义的态度来展望世界中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

有大量的女性主义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女性主义的阵营中总是有着大量分歧。因此，更合适的说法是，我个人对女性主义的解释和建构只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观点是借用了大量的女性主义观点后的混合体。尽管女性主义是非连贯性的和多样化的，但除了那些一般分析和行动诉求外，仍有一些共享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整合生活中个人和政治的维度(Millet, 1969)；尊重女性的多样性(hooks, 2000)；寻求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Collins, 1991)；变革现存的社会秩序(Adamson 等, 1988)，因为它难以满足成年人和孩子的不同需要。我用这些普遍性来探讨那些差异，那些被女性的声音所呼吁、被女性的活动所表达的差异。接着，我会考察社会工作者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务原则，这比他们将正统

的社会工作理论运用于“案主”工作中会更有效。^①虽然，我的写作主要基于英国社会背景，但女性主义透过自我反思的批判和延伸，超越社会排斥，实现社会多样化，因此，我希望我所探讨的问题也能得到其他地方女性的共鸣。

女性主义者直面平等社会关系的创造

女性主义者，作为力图从女性的视角来改善女性生活条件的女性们，一直在挑战压迫女性的不公正社会关系，这种压迫持续了几个世纪，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Basu, 1997)。在英国，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女性呼吁结束压迫现代女性的社会不公(Banks, 1981; Tong, 1989)。在正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中，女性主义聚焦于不同的议题，她们致力于确保对女性的公正，她们的努力唤起了这些地区女性的能量(Jayawardna, 1986; Basu, 1995)。

参与动员女性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和结束这种压迫的方式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西方媒体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报道集中在美国白人中产女性群体，并认为女性运动的特征是单一化。其实，多样化一直是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属性。媒体的这种态度忽视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边缘群体，特别是生活在贫穷的劳工阶层中以及生活在少数民族社区内的女性(Dominelli, 1997a)。媒体的这种观点与颠覆女性主义普世性吁求的政治策略有关，其结果是没有认识到虽然不同族群的女性诉之于不同的斗争策略，但她们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共同的诉求(Basu, 1997)。

女性主义激进分子继续在她们关注的议题上努力着，不管媒体如何呈现她们的活动、她们不同族群间的差异以及她们在目标达成上的不平衡。

^① 语言是深植于权力关系中的，这种权力关系在语言使用时是隐晦的。我将“案主”打上引号是要表明本质上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并质疑这种假设——那些以“案主”身份与社会工作者打交道的人是依赖的存在，她们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改造世界。我认为“案主”和社会工作者两者都是能影响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主体。

通过不断反思,发出不同的声音,女性坚持在象征意义上和实务上强调她们是“多样性的统一体”(Collins, 1991)。老年女性提出了年龄歧视问题(Doress 和 Siegal, 1987);女同性恋者主张性取向的多样性(Forster 和 Hanscombe, 1982; Basu, 1997);残障女性要求关注她们跨群体的需要(Morris, 1991; Begum, 1993);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女性则坚持她们精神健康发展的权利(Bayess 和 Howell, 1981; Ashurst 和 Hall, 1989)。

女性运动的非连贯性意味着,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描绘没有性别压迫的社会愿景。有些声音表达的是,要确保女性的多样性不会被目标偏狭的女性社会行动所忽视。例如,黑人女性^①企图扩大分析的角度,坚持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经历是种族化的、性别化的和阶级化的(hooks, 1984, 2000)。她们一直在批评白人女性理论家将黑人女性从她们的分析中排除出去(Bryant 等, 1985; Bhavani, 1993)。她们的著作表达了经由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而遭受的压迫的特殊性(Maracle, 1996),并坚决呼吁不要陷入压迫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压迫(Collins, 1991)。

对不同女性所持有的立场进行质疑的倾向一直根植于女性主义的承诺,也就是要自我反思、警觉和回应不同群体女性所认同的差异性需要(Collins, 1991; Dominelli, 1991)。质疑带给女性主义者诸多机会,使她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其他女性的生活经验,加深她们的分析,意识到其他女性作为公共空间的合法占有者的存在,尊重那些表达了女性的经历和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不同声音。^②

与前期女性主义者相比,除了关注的事务不同之外,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争取解放的道路也不相同,她们坚持“个人的就是政治的”(Millet, 1969)。对她们而言,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的私人领域或以

^① 当提到不同群体的女性时,语言障碍就产生了。只辨识她们的独特性就模糊了共同性。很明显,术语如“黑人女性”或“白人女性”的提法是有问题的。但是,运用它们有一个优点,即可以指出虽然经历不同,但种族歧视影响了她们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哪个类别是同质或是由彼此相似的女性组成,人口的异质性在讨论身份问题时是很重要的。当我提到身份的特定属性时,我会用其他的词。

^② 叙述者的声音也是有问题的。我既是广义女性运动的一部分,也是运动中的一个女性个体。我用第三人称复数的这种远距离的叙述手法来表明,虽然我的经验和观点中的一些元素与其他女性相同,但我并不能认定她们是谁,因而也放弃了用“我们”。我选择这么做是为了表明我特定的立场,不以过度的包容性来使用其他声音。

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中，就如同发生在公共领域中一样。她们也信奉理论和实践的整合，这个立场试图消灭将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截然分开的做法（Brandwein, 1991）。对此，她们坚持认为，目标和为实现目标所进行的活动过程有直接的联系（Cook 和 Kirk, 1983）。女性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会预存于今天她们所置身的关系之中（Dominelli, 1991b），而且，女性主义者并不只是想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她们还渴望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Basu, 1997）。这个渴望是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人类幸福应该是社会议程的核心。虽然赋予这些希望以实质内容的理念的形成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女性主义对世界的新愿景包含了以下重要观点：彼此平等的关系、相互的依赖性、代际团结，以及创造一个定位于满足而不是压迫人们需要的经济系统（Dominelli, 1991, 1997c）。简而言之，传统的做法不再是适宜的，它的持续再生产也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女性主义理论和实务对男性和儿童的意义

● 女性主义者一直高度关注社会关系在公共和私人的所有领域都具有的性别特质。她们的分析揭示出男人在很多社会领域都享有特权，这种特权是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的，包括将女性排除在有薪工作之外，而男性则占据高薪工作（Armstrong, 1984; Coyle, 1989）。女性主义研究也揭示出男性运用情感的、身体的、性的暴力对女性进行社会控制（Rush, 1980; Dworkin, 1981）。虽然男人们会说如果女性愿意，她们也可以进入男人主导的公共领域，一些女性主义者也要求男人在家里做很多传统上是女人做的家务（Segal, 1983），如家务活、养育儿童、照顾老人（Walby, 1990）。但是，其他女性主义者已经发现，将男性包括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是有问题的，因而，她们坚持女性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与男性并肩工作（Solanas, 1971; Jo, 1981; Frye, 1983）。

这样，女性主义对现实社会地位批判的一个实质内容就是，呼吁终结男性特权，因为，这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可悲的是，对这个立场的实

现已经引发了希望保留特权的保守男性的恐惧(Brooks, 1996)。他们不仅不欢迎一个可能丰富他们自己生命的事业,而且,短视地固守着一个被神化了了过去,在那里,他们被赋予不可争辩的权威(Bly, 1985)。并且,他们将致力于反对女性主义,以推翻女性主义所赢得的成果。他们认为,女性主义将有损他们的势力空间(Lyndon, 1992; Farrell, 1994)。

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若要真正自由,男性须从强加给他们自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桎梏来自他们对父权制社会关系的坚持(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 Collins, 1991)。此外,这些女性主义者还将儿童和男性包括进来作为她们社会行动的受益者。就儿童而言,这意味着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儿童作为个体有自己不可让渡的一系列权利(Clinton, 1996; Dominelli, 1999)。一些女性主义者已经在尝试寻找一些方式,既能满足女性的利益,同时,又不会有悖于儿童的权利(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其他女性主义者则发现这很困难,仍继续挣扎在调和女性生活中的矛盾(Wise, 1985)这个问题上。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发现了国家利用专业女性照顾工作者来控制其他女性(Wilson, 1977),这当然被看成是不可接受的(Marchant 和 Wearing, 1986; 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虽然女性主义的诉求获得实现的前景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但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努力使所有的人都不受压迫,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并不是寻求推翻一种压迫——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然后用另一种压迫代替它,即女人压迫男人,甚或是一群女人主导其他女人。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发端于女性主义的社会行动,这是通过社区中女性和女性共同工作而实现的(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其目的是通过将女性的个人苦难和无法与人诉说的私人悲哀与她们的社会位置和地位联结起来,以此改进女性的福祉。这意味着私人困难被重新定义为公共问题。虽然其他社会工作者坚称是社会造成了个人的问题,如 Attlee(1920),但

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首次将女性困扰的根源定义为女性的社会位置和角色。在创立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中,女性激进分子借鉴了女性主义的一般观点,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这样就与女性主义运动达成了互动的关系,为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做出了贡献。

我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的实务形式:从女性的经验出发来进行分析,专注于女性社会位置与其个人困苦间的联结,回应她的独特需要,创设工作者和“案主”间的平等关系,并探讨结构上的不平等。以整合的方式迎合女性特定的需求并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包括大量的压力和对女性的各种形式的压迫,这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对社会关系中互相依赖的本质的关注确保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正是那些与女性有互动关系的人的需要,即男性、儿童和其他女性的需要。

通过在分析中给女性一个值得自豪的位置,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挑战了那些在人类普遍性的伪装下,将女性看成是男性附属的性别盲区的理论和实务(Harding, 1990)。性别盲区并不是真的没有性别特征,而是代表了男性的思考、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在社会工作中,这些将被女性中心的观点所取代(Hanmer 和 Statham, 1988),女性中心的观点倡导对女性“案主”和女性工作者的需要做出敏感的性别化的回应。近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更是全面地将男性整合到其理论和实务中(Dominelli, 1991; Cavanagh 和 Cree, 1996; Orme 等, 2000)。

但是,这些关于女性位置的概念化并不是没有问题的。Ramazanoglu (1989)对于将女性看成是单一、同质的类别质疑。她指责这些是“本质主义者”,忽视了种族、残障、年龄、性取向和其他社会分类对性别关系的影响。而且,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女性主义实务,她们更强调话语和权利在个人互动中,包括“案主”和工作者关系中的作用(Lloyd, 1998)。

本质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论述进行批评(Brook 和 Davis, 1985; Marchant 和 Wearing, 1986; Burden 和 Gottlieb, 1987; Hanmer 和 Statham, 1988; 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 Langan 和 Day, 1992)。建构一个适用于所有“案主”的个案是很困难的。较之于其他内容,一些人更强调社会分化的广泛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特定地域中的女性都是很明显的。Dominelli 和 McLeod(1989)就主张将他们的分析进行修改以适用这种多样性,Langan 和 Day(1992)的解决方案则是对每个社